

主 编 邢占军

副主编 吴东民 于 萍 褚 雷

# 中国 幸福指数报告

( 2006~2010 )

Well-being Index  
in China ( 2006-2010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主 编 邢占军

副主编 吴东民 于 萍 褚 雷

# 中国幸福指数报告

( 2006~2010 )

Report on  
Well-being Index in China

( 2006-2010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幸福指数报告：2006～2010/邢占军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

ISBN 978-7-5097-5745-1

I. ①中… II. ①邢… III. ①幸福-社会心理学-研究报告-中国-2006～2010 IV. ①B841 ②C91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9746号

## 中国幸福指数报告(2006～2010)

主 编 / 邢占军

副 主 编 / 吴东民 于 萍 褚 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郑 嫵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拥军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字 数 / 260千字

印 次 /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45-1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摘要

随着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定位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越发凸显。本报告在对幸福指数概念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依据所构建的客观福祉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对中国 2006~2010 年的客观福祉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客观福祉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10 年较 2006 年增长了 37.1%，年均增长 9.3%。五年间，社会福祉和环境福祉提升幅度较大，与 2006 年相比分别提升了 88.3% 和 64.3%。中国客观福祉的省际差距十分明显。各年份客观福祉总分最高的省份与总分最低省份之间的差距在 3.5~4.5 倍，这种差距在各个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最高差距达到了 6.5 倍。从各区域客观福祉评价结果来看，各年度均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较小。五年期间，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呈减小的趋势。本报告试图为全面评价“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的进步、诊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考察宏观政策对客观福祉的影响提供依据。

## Abstract

While China is stepping o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ts targe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re now open for reasonable readjustment.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ogeth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s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s and the footholds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reform. Thus the people's sense of well-be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current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over some basic issues related to well-being index, this report evaluates the o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2006 to 2010 by taking both the objective well-being index system and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into serious accou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objective well-being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Compared with the year of 2006,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increased 37.1% in 2010.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turns out to be 9.3%. Within these five years, the social well-be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well-being increased 88.3% and 64.3%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of o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quite distinguishable. There are wide gaps between the provinces with very high scores and those with very low scores. The highest score is about 3.5 - 4.5 times of the lowest one. Furthermore, the gaps within each detailed dimension are much more prominent, with the highest 6.5 times higher than the lowest. Observed on the regional level, the annual objective well-being shows the trend of a gradual decrease: the east winning the first prize, then the northeast, then the central, and finally the western. The biggest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a milder gap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central region. Gaps also exist between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and of course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 region. The gap between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at betwee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east obvious. From 2006 to 2010, the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other regions gradually became narrower and narrower. This report

attempts to provide a more dynamic and mor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progress of China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 It also aims to diagnose the major problems our society is confronted with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examine and to define how and to what degree the macroscopic public policies are affecting the o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

## 目 录

---

导 言	001
2006 ~ 2010 年中国客观福祉的走势与区域差异	022
中国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报告	046
中国经济福祉报告	086
中国文化福祉报告	126
中国社会福祉报告	170
中国环境福祉报告	213

## 导 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引起了国内学界、媒体、决策面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不断抛出有关幸福指数的话题，不同层面的决策者对幸福指数普遍给予了相当积极的回应，公众则通过各种媒介特别是互联网表达着对幸福指数的复杂心态。来自社会的各种不同反应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幸福指数的研究。从学界来看，尽管幸福指数在国内看似一个全新的话题，其实国内学者对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已走过了30多年的路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幸福指数相关的研究，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相伴而行，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对其表述形式以及相关研究对决策面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到了今天，随着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定位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越发凸显。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对幸福指数有关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始自2002年。从2009年起我们开始更为明确地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探讨幸福指数，并力图推出一套能够评价当下中国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这样一套指标体系，不仅可以用于全面评价社会的进步程度以及诊断宏观决策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为突破“简单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评价模式提供想象空间。2011年我们首次公布了这套指标体系，并详细报告了其编制过程<sup>①</sup>。本报告可以视为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幸福指数研究努力的延续，只不过更加侧重幸福指数研究的咨政价值。为了展现本报告的推出背景以及本团队的一些基本理念，导言将系统梳理国内幸福指数的相关研究，尝试厘清幸福指数的含义、研究价值、构

---

<sup>①</sup> 邢占军等：《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建方法和政策功能等基本问题,对今后幸福指数研究和实践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加以思考<sup>①</sup>。同时,导言将对本报告的研究思路以及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给予简要介绍。

## 一 国内幸福指数相关研究 30 年的历程

在考察国内幸福指数研究历程之前,首先要对作为讨论前提的相关议题加以限定。对于幸福的科学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个体微观角度出发,主要为临床心理、工商管理、社会工作以及教育管理等相关领域研究者所关注。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升针对个人或群体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组织管理水平,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康复,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另一种视角则基于社会宏观的角度,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等领域。这类研究所针对的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以及对特定社会进步与发展状况的评价,其目的在于帮助不同层面的社会决策者更好地进行公共决策,以增进民众的福祉,使民众享有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两种研究取向所讨论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所采用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也相差较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幸福的科学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前一种取向,特别是其中与临床心理相关的研究,国外常常用“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sup>②</sup>加以概括。这一研究方向至今在国内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其所涉内容显然不包括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议题之中。

“幸福指数”这个术语在国内研究文献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从“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检索到的第一篇题名含有幸福指数的文献是发表在《市场与人

① 作为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导言的部分内容曾经在“两岸三地华人社会幸福状况的探讨”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交流,并发表在《应用伦理评论》2012 年第 52 期上。

② “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质量”经常被定义为:特定的医疗条件或治疗对一个人实际的或者所预期的身体、情绪和社会方面良好感受的影响程度,参考 D. F. Cella,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palliative care”, *Seminars in Oncology* 22 (1995): 73-81。

口分析》1997年第1期上<sup>①</sup>，是一篇编译自美国期刊上的科普类文章，严格地讲称不上“研究”。与幸福指数相关度最高的术语“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在国内文献中首次出现是1980年，要比“幸福指数”早得多。尽管与“幸福指数”相比，以“生活质量”为题名的文献大多基于个体微观角度，但其中不乏社会宏观层面的研究<sup>②</sup>。另外两个与生活质量相关度很高的术语，分别是“满意感”（life satisfaction）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首次在国内文献中出现的时间也早于“幸福指数”。因此，对国内幸福指数研究历程的考察要合乎逻辑地向前追溯，宏观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含满意感和幸福感研究）也包含其中。分别以“生活质量”“满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数”为题名对“中国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搜集到1980~2011年属于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有效文献4223篇（见表1）。下面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对国内30多年幸福指数研究的历程加以梳理。

表1 通过题名检索的历年发表的幸福指数相关论文统计

单位：篇

发表年份	生活质量	满意感	幸福感	幸福指数	合计
1980	1(1)				1(1)
1981	1(1)				1(1)
1982	0				0
1983	2(2)	1(1)			3(3)
1984	1(1)	0			1(1)
1985	3(3)	1(1)			4(4)
1986	2(2)	0			2(2)
1987	7(5)	0			7(5)

① 这篇题名中含有“幸福指数”的文献为《构建幸福指数》，是编译自 *American Demographics*（1996年）上的一篇文章。通过对“中国学术文献总库”的题名检索发现，国内第一篇题名含有“幸福感”的文献出现在《世界知识》第13期（1991年），标题为《富裕的日本人缺乏幸福感》，是一篇科普类文章，介绍的是日本的相关研究。第一篇题名含有“生活质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1期（1980年），译自韩国期刊《政经文化》第1期（1980年）。

② 根据文献检索分析，题目中含有“生活质量”且属于社会宏观层面的研究，大约占到该类文献总量的28%（参见表1）。

续表

发表年份	生活质量	满意感	幸福感	幸福指数	合计
1988	7(3)	1(0)			8(3)
1989	9(8)	1(0)			10(8)
1990	18(6)	1(1)			19(7)
1991	18(7)	1(1)	1(1)		20(9)
1992	26(12)	0	0		26(12)
1993	33(13)	0	1(0)		34(13)
1994	55(18)	2(2)	0		57(20)
1995	76(37)	1(0)	1(1)		78(38)
1996	97(18)	1(1)	3(3)		101(22)
1997	102(34)	2(2)	4(4)	1(1)	109(41)
1998	136(29)	5(4)	6(4)	0	147(37)
1999	153(47)	6(1)	6(4)	0	165(52)
2000	217(43)	1(0)	6(5)	0	224(48)
2001	267(54)	5(4)	3(3)	0	275(61)
2002	333(60)	9(8)	26(19)	0	368(87)
2003	485(75)	14(6)	54(33)	1(0)	554(114)
2004	672(80)	7(4)	56(38)	6(3)	741(125)
2005	868(119)	18(11)	100(77)	17(16)	1003(223)
2006	1058(117)	30(16)	154(101)	51(36)	1293(270)
2007	1067(139)	31(15)	279(213)	62(40)	1439(407)
2008	1187(128)	26(9)	371(322)	69(52)	1653(511)
2009	1312(130)	15(6)	481(414)	53(43)	1861(593)
2010	1631(144)	16(6)	546(466)	79(50)	2272(666)
2011	1591(138)	20(12)	707(579)	164(109)	2482(838)
合计	11435(1474)	215(111)	2805(2287)	503(350)	14958(4222)

注：表中的资料是分别以“生活质量”“满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数”为题名在“中国学术文献总库”（1980~2011年）相关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各类文献的篇数，其中括号内的资料是排除了个体微观研究视角以及报道、传记、书评、信息等类型的文献后，真正意义上属于社会宏观视角的幸福指数相关研究，占检索到文献总量的28%。

### （一）引进起步阶段（1980~1990年）

这一阶段的文献以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主。检索到的35篇文献中有20篇属这类文献，或直接译自国外期刊，或介绍国外研究，或对国外研究加以综述，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苏联、英国、联邦德国、加拿

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中国澳门等，其中有7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期刊《国外社会科学》。国内第一篇以“生活质量”为题的文章，讨论的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人口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其中老龄化和劳资关系问题“同未来的人的生活质量将有密切的联系”<sup>①</sup>，尽管没有查到这篇文献的引用记录，但其有着标志性意义，从此生活质量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不仅如此，该文还暗合了后来国内一度出现的“人口生活质量”的提法。这一阶段引用较多的一篇文章是译自 *Annual Sociology Review* 的一篇文章，该文以美国和加拿大1975~1985年间生活质量研究的文献为基础，对生活质量的含义、测量、理论以及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作者指出“有关生活质量的经验研究表明，研究内容一直在人们生活的客观方面（如食物和居住）和主观方面（如态度和感情）之间徘徊”<sup>②</sup>，但该文显然站在了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主观方面一边，花费较多篇幅介绍了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进展。该文还提到了美国生活质量研究者坎贝尔等人对生活质量的经典定义：“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该定义一段时期内对国内幸福指数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国内研究者对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研究和探索，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较早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起草的社会统计指标草案<sup>③</sup>。1986年北京市推出《首都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将生活质量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包含人均年文娱性消费支出、每万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自由支配时间比率、环境综合指数等22项客观指标<sup>④</sup>。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相关研究是由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与天津和上海两家地方社科院合作完成的。他们的研究主要强调生活满意感，这一点明显受到了美国学界更为强调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影响。林南与天津社科院合作采用因素分析法和

① 尹钟周：《人口学与生活质量》，《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11期，第49页。

② K. 苏斯耐、G. A. 费舍：《“生活质量”的社会学研究》，唐仲勋、叶南客译，《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第58~63页。

③ 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8页。

④ 陶冶：《关于生活质量和主观指标研究》，《上海综合经济》1994年第9期，第19~21页。



结构方程模型法,通过测量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满意程度,提出了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并采用天津市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sup>①</sup>。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林南和卢汉龙将生活质量界定为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sup>②</sup>。一些研究者将侧重点放在了客观指标方面,在着重介绍国外生活质量客观指标研究的同时,尝试对国内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探讨<sup>③</sup>。按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1981~1990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这一阶段国内从上到下关注点都在发展经济,因而与幸福指数密切相关的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并未引起决策面的足够注意。围绕着各级决策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政策的有效性,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有关政策研究机构更为重视那些能够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而这种态势反过来又影响了学界的研究走向。但毫无疑问,这一阶段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引进和探索,深深地影响着国内当下的幸福指数研究。

## (二) 探索成长阶段(1991~2000年)

1991年以后,国内学界对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的研究逐渐升温,通过“中国学术文献总库”检索到1991~2000年相关文献292篇,尽管数量已接近上个阶段的9倍,但总量仍然不大。生活质量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研究,沿着各自的方向在不断推进,一些研究者试图对这两个方面加以整合。从文献类型看,这一阶段的文献涉及生活质量研究的多个分领域和多个特定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研究者们围绕着生活质量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等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展开讨论,较为深入而系统地了解了国外生活质量相关研究的状况与走势,出现了以幸福指数为题的文献。研究者们探索努力使得宏观层面生活质量研究在国内不断拓展。

① 林南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第73~89页。

② 林南、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75~97页。

③ 郭慧珍:《关于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探讨》,《经济科学》1987年第6期,第78~89页;王成岐:《生活质量测定方法》,《统计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45页;胡雪萍:《如何评估我国的生活质量》,《消费经济》1990年第6期,第52~55页。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1991~200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90年代起,原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等单位开始对中国小康问题进行细化,各种小康标准逐渐提出,其中生活质量被视为小康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课题组,推出了由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构成的小康社会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推出了衡量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将生活质量作为评价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由23个指标构成的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sup>①</sup>。目前全面小康标准仍然是国家统计局和相关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问题。小康指标体系的编制无疑大大增强了社会和决策面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这类指标的编制基本上因循的是客观指标的传统。在此期间一度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一批人口经济学研究者所推动的“人口生活质量”研究<sup>②</sup>,这类研究对生活质量的界定遵循了国际上主客观结合的趋势,但是在具体指标设定时采用的仍然是生活质量的客观评价指标。一些研究者试图从全球视角来考察国内的生活质量状况,这类用于国际比较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也是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朱国宏采用教育、健康、营养、平等、环境5个方面8个指标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9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测算<sup>③</sup>。冯立天采用所编制的指标体系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核算与比较研究<sup>④</sup>。赵彦云等编制了包括9大类34项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和40多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研究<sup>⑤</sup>。地区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也开始出现,一些研究者从客观方面分别对辽宁营口、吉林、江苏等地的生活质量进行了量化研究<sup>⑥</sup>。

① 朱庆芳:《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目标的综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103~120页。

② 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6期,第7~14页。

③ 朱国宏:《生活质量综合指数问题初探》,《经济学家》1993年第2期,第98~106页。

④ 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与国际比较》,《人口学刊》1995年第6期,第3~15页。

⑤ 赵彦云、李静萍:《中国生活质量评价、分析与预测》,《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第32~40页。

⑥ 舒樵:《营口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第31~40页;历复魁:《吉林省社会生活质量的预测与分析》,《人口学刊》1995年第6期,第47~59页;黄润龙:《江苏人民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6~17页。



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明显滞后于客观生活质量研究,对决策面的影响也相对较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术语“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段建华发表在《心理学动态》上的一篇文章从心理学角度梳理了国外的幸福感研究,其中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sup>①</sup>。尽管一些学者对生活质量的 subjective 方面给予了相当的关注<sup>②</sup>,但在这一阶段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主观生活质量量化研究。几项影响较大的量化研究都是针对特定地区的居民,这些研究者主要采用满意度指标分别对北京、西安、扬州、厦门、武汉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研究<sup>③</sup>。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sup>④</sup>。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主张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加以结合,以全面反映生活质量状况。卢淑华和韦鲁英在对北京、西安、扬州三市进行生活质量模式的实证研究中,不仅引入了客观指标,而且增加了“参照标准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个中介变量,提出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sup>⑤</sup>。叶南客在对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评估时采用了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生活方式和社会感受4类指标,力图将主客观指标加以结合<sup>⑥</sup>。李

①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心理学动态》1996年第1期,第46~51页。

② 陈义平:《两种生活质量评估方法的比较分析》,《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第38~45页;李新家:《论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标和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52~55页;詹天庠、陈义平:《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7年第6期,第26~34页。

③ 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与人口特征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58~69页;胡荣:《厦门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82~87页;易松国、风笑天:《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82~85页。

④ 段建华:《总体幸福度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年第1期,第56~57页;刘仁刚、龚耀先:《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年第2期,第73~78页;何瑛:《重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重庆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第35~38页。

⑤ 卢淑华、韦鲁英:《生活质量与人口特征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58~69页。

⑥ 叶南客:《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评估与提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135~148页。

凌江等人在对湖南省小区居民生活质量进行考察时也试图将主客观指标结合,采用了包括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4个维度在内的生活质量问卷<sup>①</sup>。风笑天等人总结指出,单用主观指标或单用客观指标都难以全面地了解和测量生活质量的真实状况,而各种具体的客观生活质量指标在解释人们主观的“满意度”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探索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以上是1991~2000年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这一阶段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也出现了细化的倾向,一些更为具体的生活质量研究领域开始在文献中独立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老年生活质量研究。如前所述,我们检索到的第一篇以“生活质量”为题名的文献就涉及韩国的老龄化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许多地区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生活质量引起了研究者更多的关注<sup>②</sup>。研究者所涉猎的另外一些具体领域包括婚姻家庭生活质量<sup>③</sup>、青年生活质量、农民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闲暇生活质量等。<sup>④</sup>

与本报告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篇文章出现在这一阶段,那就是《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年第1期刊发的《构建幸福指数》。该文编译自《美国人

① 李凌江等:《小区人群生活质量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5年第2期,第58~61页。

② 叶南客、唐仲勋:《老年生活质量探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第130~137页;潘祖光、王瑞梓:《中国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人口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40页;赵细康:《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主观评价分析》,《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6期,第15~20页;张智敏:《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年第6期,第36~38页;姜晶梅、韩少梅、张孔来:《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综合评价》,《中国卫生统计》2000年第6期,第29~30页。

③ 卢淑华:《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第84~91页;易松国、风笑天:《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构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第136~144页。

④ 叶南客、李芸:《当代青年生活质量的评估》,《青年研究》1992年第1期,第22~25页;吴晓刚:《当代青年的工作生活质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第44~48页;陈长华:《江苏农民生活质量评价与比较》,《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113~132页;黄志秋:《论文化生活质量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第17~22页;王雅林、车路光:《非在业群体闲暇生活质量考察》,《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89~98页。



口统计学》(*American Demographics*)杂志,原作者 Kacapyr 是一位经济学者。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只是一篇介绍该杂志推出“美国人口统计学幸福指数”的短文。这篇文献为读者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1) 现有的经济发展指标(例如 GDP、CPI)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而一些用来评价生活质量的其他指标也与 GDP 一样,只考虑了国民生活的某个侧面;(2)“美国人口统计学幸福指数”是一种复合指标,涵盖了收入和就业机会、生产力和技术、休闲、消费者态度、社会和物质环境等 5 大领域,每个领域都由两三个要素组成,能够全面衡量国民的幸福状况;(3)该指数从 1990 年 4 月开始测试,以这次测试的数据为基点,记作 100,以后每个月的数据与之比较,就可以反映美国生活质量的走势;(4)由于包含了很多价值判断,测量幸福指数十分艰难,需要不懈地努力。这篇短文堪称普及幸福指数常识的一篇很好的材料。<sup>①</sup>

### (三) 快速发展阶段(2001 年以后)

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内宏观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2001 年是国内“新三步走”战略的起始年,随着小康目标的实现<sup>②</sup>,国内社会财富积累达到了新的水平,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仍然较大,一些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价值缺失等)也凸显出来。社会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所越发深入。在这一阶段,生活质量客观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进展,诞生了第一家生活质量研究机构——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出现了一批有

- 
- ① 伊里亚·卡派尔:《构建幸福指数》,《市场与人口分析》1997 年第 1 期,第 61~62 页。
- ② 根据邓小平的估算,人均 GDP 达到 800~1000 美元是中国小康水平的标志性指标。他提出,到(上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800~1000 美元,进入小康社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68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732 页])。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89404 亿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人均 GDP 首次超过了 800 美元。“新三步走”战略在 1997 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首次正式提出,在 200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最终形成。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2010~2020 年是第二步,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2020~2050 年是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